

隔离型自保：个体环境健康风险的市场化应对

耿言虎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当前,中国已进入环境健康高风险期,公众的健康焦虑感愈发强烈。在多样化的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策略中,个体通过市场化手段把自身同污染源隔离,进而实现自我保护的隔离型自保日益增加。居民健康焦虑的持续增加、购买力的增强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是隔离型自保措施产生的原因。但市场化的隔离型自保亦产生了严重的潜在后果,表现为环境不平等的再生产、污染漠视和精英抽离、环境问题的加剧、社会资源的浪费等等。隔离型自保仅是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权宜之计,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多方努力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健康风险。

[关键词]健康焦虑;隔离型自保;环境健康风险;市场化应对;环境共同体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西南地区资本下乡的环境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研究》(15CSH028);安徽大学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引进工程(J01006083)

[作者简介]耿言虎(1986—)男,安徽长丰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8-0195-06 [收稿日期]2017-03-12

一、风险时代的健康焦虑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写道“19世纪,掉到泰晤士河里的水手并不是溺水而死,而是因吸进这条伦敦下水道上的恶臭和有毒的水汽窒息而死的”。贝克进而指出,后工业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逻辑已从“财富的分配逻辑”转移到“风险的分配逻辑”上,从“我饿”变为“我怕”^{[1] P15-19}。在众多的现代性风险中,环境健康风险由于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近年来中国的空气质量、水环境、土壤环境、食品安全等状况日益严峻,公众正面对越来越多的环境健康风险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环保部2014年公布的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显示,中国1.1亿居民住宅周边1公里范围内有石化、炼焦、火力发电等重点关注的排污企业,有5.9亿居民在室内直接使用固体燃料做饭,4.7亿居民在室内直接使用固体燃料取暖,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2]。

目前,中国已进入环境健康高风险期。首先,环境事件频发,海洋漏油、化学品爆炸、水污染、重度雾霾、土壤污染等事件严重威胁着公众的生命和健康。环保部通报信息显示,2013—2015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分别为712、471和330起^[3]。虽然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基数依然很大。其次,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

“环境公害病”呈现迅速增加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的主要相关因素已从贫困转变为污染^[4]。环境污染导致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增加,环境流行病学已有大量的研究。殷永文等研究发现,雾霾与呼吸系统疾病具有明显关联。以上海为例,PM10日均浓度每增加50 $\mu\text{g}/\text{m}^3$,呼吸科、儿呼吸科日均门诊人数分别增加3%和0.5%;PM2.5日均浓度每增加34 $\mu\text{g}/\text{m}^3$,呼吸科、儿呼吸科日均门诊人数分别增加3.2%和1.9%^[5]。关于“癌症村”和“怪病村”,媒体和学术界已作了很多报道及研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团队的研究显示,淮河流域八县区消化道肿瘤(肝癌、胃癌、食道癌等)严重高发与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具有“相关关系”^[6]。

因此,某种程度上,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7] P5}共同制造了公众的风险恐惧。有学者把风险社会形容为“焦虑社会”^{[8] P58}。具体到环境健康领域,处于日益增加的环境健康风险中的公众风险感知愈发强烈,其心态可以表述为“健康焦虑”。社会心理研究领域,焦虑多指一种群体的具有一定持续性的恐惧心理状态。在医学中,健康焦虑被视为一种临床症状,是一个连续的症状谱,一端是对躯体感觉的轻微关注,另一端是持续、强烈的与健康相关的恐惧和先占观念^[9]。在本文语境中,健康焦虑取后一含义,系指一种持续的

心理状态,而非一种临床病症。这种心理状态表现为对环境健康风险(水、空气、食物等)可能对身体产生健康损害的不同程度的紧张、担忧和不安全感。另外,与医学指涉对象不同,本文中健康焦虑指涉的并非是一个体的心理状态,而是群体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公众的健康焦虑会驱动出何种行为?这些行为又会产生哪些后果呢?笔者将在下文分别述之。

二、作为风险应对策略的隔离型自保

环境健康风险种类繁多,需要对其进行分类才可以合理分析应对策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环境健康风险有不同的分类形式。按照风险的表现形式,环境健康风险可分为集聚型环境健康风险和弥散型环境健康风险两类。集聚型环境健康风险,具有明确的风险源,风险源呈点状分布,可能致害方式较为明确,发生于局部空间,受影响人群有限,主要发生于特定的工程项目,如化工厂/核电站/垃圾焚烧厂等。弥散型环境健康风险,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没有明确的风险源和应对对象,风险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多发生于日常生活领域,风险大小依赖行为者自身的风险感知,如空气污染健康风险、水污染健康风险等。

人们如何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呢?有研究者把环境健康风险的行动类型归纳为三类:弱行动意愿/个体化倾向,如忍耐、抱怨、发牢骚等;强行动意愿/群体化倾向,如向网络、媒体、环保组织反映,向政府施压等;强行动意愿/个体化倾向,如利用法律手段、考虑搬迁、购买净化器或纯净水、独自向政府施压等^[10]。但实际上,这些行动策略的归类仅仅注意到集聚型环境风险的应对,而没有意识到弥散性环境风险的应对策略。集聚型环境健康风险由于风险源具体且明确,受影响对象亦较为明确,因而易于群体或者个体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比较典型的如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维权和邻避行为等方式。

但是,弥散性环境健康风险的应对策略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美国社会学家萨斯指出,当环境风险没有明确的污染物或污染对象时,应对策略主要依赖于个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和体验以及个体的应对能力。作为一种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包含了某种形式上的不确定性,何种物品有污染、何种物品对身体有害,污染通过何种途径引起健康问题等,这些公众是不清楚的,故极易引起公众某种程度的恐慌和焦虑。萨斯进而指出,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把危险源隔离在一定的封闭区域的方法解决所遭遇的问题,如对麻风病人、精神病人实施隔离。但

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反向隔离”(inverted quarantine)^{[11][P1]},即个体采取措施,主动把自己与有害的外部环境隔离开来。行为者自身成为隔离的对象,每个个体好像有一层膜将自己与外部环境隔离开。反向隔离是在人们暂时无法改变现状时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通过采取这一措施可以减少行动者所受到的伤害。在环境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中,反向隔离成为日常生活中中心化的组织原则^{[11][P95]}。

笔者提出“抗争型自保”和“隔离型自保”这样一组概念,分别对应集聚型环境健康风险和弥散型环境健康风险的主要应对方式与策略。所谓抗争型自保,是指采取主动对抗,企图消灭风险源或者逼迫风险制造者主动采取措施消除风险的行为。所谓隔离型自保,是指个体对环境健康风险采取自我隔离措施,以求降低或消除风险对自身影响的行为,是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环境健康风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相对“消极”的风险应对方式。随着中国公众感知的环境健康风险日益加剧,个体层面追求自我保护的趋向愈以明显。由于环境的破坏以及疾病的增加,公众越来越意识到清洁的食物、水源、空气的重要,无论是中国农村,还是城市居民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受污染源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以及环境治理的长周期性等因素制约,环境健康风险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实行隔离型自保成为较为常见的措施。隔离型自保有不同的途径与方式,按照是否借助市场化的方式,可以分为非市场化应对(如呆在家中、种植室内植物、减少户外运动等)和市场化应对措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购买服务是隔离型自保的重要途径,且在当下中国有愈加明显的趋势。本文主要关注环境健康风险的市场化应对。市场化方式的隔离型自保迅速增加,主要有赖于以下三个条件:

(1) 公众健康焦虑感的持续增加。健康焦虑感来源于对环境健康问题的风险感知。个体的环境健康风险感知能力与现实的环境状况、公众的环境健康知识、环境教育和宣传以及环境状况监测技术等密切相关。无论是监测数据还是主观感受,中国的空气质量、水环境以及土壤污染等均不容乐观。公众对甲醛、二噁英、雾霾、PM2.5、转基因等的认知程度日益加深,这些专业术语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用语,迅速“常识化”。新闻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也加深了公众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关注与担忧。例如,2015年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的《穹顶之下》视频在网络持续“刷屏”,一夜之间普通大众对雾霾有了新的认识。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环境监测方式日益多样化,获取渠道也日益多元化,“空气卫士”、“污染地图”、“PM2.5预报”等app逐

渐成为手机的“标配”。

(2)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及购买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居民对环境健康状况的关注日益增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市场中通过购买安全产品的方式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都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从1980年的739元、398元提高至2015年的31195元、11422元。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明显,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85年的53.3%、57.8%降至2015年的34.8%、37.1%^①。恩格尔系数下降,同时也意味着除了基本的食品开支以外,居民有更多的经济能力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

(3) 环保健康产业快速发展。随着环境问题的持续凸显,嗅觉敏锐的资本看到了环境健康产业蕴藏的巨大商机,纷纷抢食这份市场“蛋糕”。中国家庭的净水器普及率只有5%^[12],空气净化器普及率只有1%^[13],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极大的增长空间。围绕人们的环保和健康需求,相应的产品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购买选择。高档饮用水、净水器、有机生态农产品、建筑生态环保材料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日渐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环境与健康产业的发展为一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了可以实现规避环境健康风险的可能。

表1 中国部分高端矿泉水品牌源地、特征及价格

品牌	源地	特征	市场零售价 (500ml)
帕米尔	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峰冰川	结构化小分子簇团, 氘含量低, 天然弱碱, 含丰富的天然微量元素, 医疗特性	15元
世罕泉	黑龙江省克东县天然苏打泉	小分子团水, 弱碱性水, 氘含量低	11元
西藏5100	念青唐古拉山南	小分子团水, 弱碱性, 富含锂、锶、偏硅酸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9.9元
依云	法国阿尔卑斯山	天然过滤和冰川砂层的矿化, 注入天然、均衡、纯净的矿物质成分	9.9元

资料来源: 中商产业研究院, 网址 <http://www.askci.com>; 京东网上商城, 网址 <https://www.jd.com>。

(二) 与食物相关的隔离型自保。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因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加之土壤、水质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民以食为天”,食品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令公众不安。在食品安全焦虑的刺激下,中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开始出现转变,公众对健康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逐渐受到欢迎。一些富人甚至专门从国外进口食物。为了应对食品安全威胁,中国消费者形成了“一家两制”的消费模式以寻求自我保护:在农贸市场、大型超市普通区等主流食品消费渠道之外,开辟出替代消费渠道,如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巢状市场等。据409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77.53%受访者因为

三、隔离型自保表现形式

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环境破坏使得消费模式更加依赖购买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而非免费获取的环境产品(free access environmental goods)^[14]。在中国,市场化的隔离型自保措施被越来越多地采用。本文将从公众日常生活中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阐述隔离型自保的实践和主要表现。

(一) 与饮用水相关的隔离型自保。中国水污染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由于水体的富营养化,主要湖泊“蓝藻”事件频发,饮用水水质状况堪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自来水检测指标相对较少。公众对于自来水水质的焦虑程度日益加深。针对饮用水安全问题,很多家庭安装净水器或者使用桶装水、瓶装水以替代自来水,这些成为应对水健康风险的主要策略。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净水器使用率达75%。《2015年净水器行业蓝皮书》显示,2014年,中国净水市场总规模约为121亿元,相比2013年的72亿元增长了66.9%。2011—2014年,水处理行业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2.5%^[15]。高端水消费增长迅速,市场中主打天然、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高端矿泉水品牌不断涌现(见下表1)。市场上高端水消费量势头明显,2015年,中国高端水市场销量达667千吨。高端水零售额从2010年的55亿元增至2014年的128亿元^[16]。

食品安全原因在进行差别化的食品消费^[17]。有机产品一般价格较高,往往是普通食品价格的数倍。2016年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健康型食品生产提供了契机。为了迎合公众的消费需求,一些生产者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纷纷加入到有机食品这一朝阳产业。2015年,中国有机产品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生产总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有机产品消费国^[18]。

(三) 与空气相关的隔离型自保。近年来,随着中国雾霾大面积的暴发,空气污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由于空气污染具有扩散性的特征,生活于特定区域的人难以逃离。隔离型自保的主要措施在于把生活和工

①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作的局部空间营造出相对健康的小环境。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的家庭空气净化器的购买人数迅速增加,采用静电吸附原理的空气净化器能吸附空气中的粉尘,起到一定降尘作用。近几年,中国国内空气净化器市场规模呈现持续扩张趋势。2013年,国内空气净化器市场规模增速超过160%;2014年,市场增速超过30%,零售量、零售额分别达到510万台和115亿元^[19]。一些居民尽量减少外出,高价购买防霾口罩^[20]。除了室外空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也受到公众关注,生态型材料的绿色家具日益受到追捧。

此外,移民也是隔离型自保的表现之一。依据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人口的移动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导致的结果。近年来,环境状况成为人口迁移的越来越重要的参考因素^[21]。为了躲避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而迁移的人口呈现增加的趋势。“雾霾移民”成为一个新词汇^[22],中产阶级从雾霾严重的地方移民到南方或者国外的意愿日益强烈。

四、隔离型自保的潜在后果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风险规避方式,隔离型自保对个体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环境健康风险。但作为一个被越来越多被采用的群体行为,亦会产生很多潜在后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再生产了环境不平等。贝克指出,“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现代社会的环境风险表现出跨阶层、平均地影响着每一个人^{[1][P83]}。但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不平等仍然存在。隔离型自保即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环境不平等。个体之间的经济能力有差异,穷人的行动能力很弱,富人则拥有较强的行动能力。据阿里巴巴对绿色消费的调查显示,绿色篮子平均溢价33%,绿色家居商品平均溢价60%^[23]。隔离型自保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作支撑,由此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越是穷的人,越无法采取市场化的隔离型自保措施,遭受更多的环境健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越是富人,越有能力采取更多的隔离型措施,则越有可能逃脱潜在的环境危险。每个人并非平均地承受污染,环境风险对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的人群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人们承受环境风险的大小与经济能力挂钩,人的健康水平与经济水平挂钩,这是不平等再生产的体现。所以,围绕隔离型产品消费的阶层区隔日渐形成。据报道,一位知名度较高的“富二代”在采访中表示,其日常食物和饮用水全部从外国进口,甚至煮饭用的水都是斐济进口^[24]。这或许代表了部分富裕阶层的消费方式。甚至有媒体戏言,一些政府部门使用的是“特供空气”、“特供水”、“特供粮食”这种鲜明

对比极有可能加大底层民众的不公平感,引发群体间的矛盾与对立。

第二,造成污染麻木与精英抽离。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与自身所处的环境状况有很强的关联。环境隔离型自保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一种优越的“小环境”,一方面减少了个体可能遭受的环境危害;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引起了个人对环境的冷漠和不关心。在隔离型自保措施下,人与自然进一步疏远,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从“亲自然”转向“离自然”、“恐自然”。人们处于自己的安乐窝中,享受着至少看上去“优质”的水、空气和食物等,却不管外部环境是何等糟糕。对个体而言,环境“去问题化”并没有能够真正改善环境问题^[25]。另外,隔离型自保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精英阶层置身于环境风险之外,更加造成环境抗争的组织动员难度加大。萨斯指出,反向隔离措施容易造成“政治麻痹”^{[11][P194]}。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人可以真正逃离于环境风险之外。精英群体远离或是自以为远离了环境风险后,潜意识里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这对他们参与环境抗争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精英群体往往在这类环境运动中担任核心角色。在一些案例中,受害者中的精英群体甚至通过移民等措施从高环境风险的地方逃离,剩下的普通民众面对强大的污染企业,抗争胜算几率可想而知^[26]。

第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随着环境状况日益恶化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健康风险日益被“问题化”,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公众感知的环境健康风险,某种程度上是“实在”与“建构”叠加的产物。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指出,风险本质上是“文化建构”的产物,“风险是真实的,但对风险程度的认知是社会建构的”^{[27][P5]}。除了客观存在的环境健康风险以外,媒体、舆论与个体对健康的关注等也在合力建构环境健康风险。真实的环境健康风险与居民认为和感受中的风险存在不对称的问题。例如,在雾霾恐慌的心理作用影响下,一些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大雾天气也会被误认为是雾霾。由于媒体的宣传以及居民的恐惧心理,居民环境健康风险的感受通常高于真实风险,“风险的社会放大”^[28]成为现实。另外,隔离型自保的广泛使用也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焦虑传递”,民众对环境健康风险的焦虑因相互传染而进一步加深。所以,隔离型自保存在过度化的趋向。如果人人都采取此类措施,势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如大量进口国外的水、蔬菜等,高价购买空气、水净化设备等。

第四,隔离型自保行为本身加剧环境问题。由于隔离型自保的存在,大量用于隔离的消费品被生产、消

费和丢弃。美国社会学家施耐博格“生产跑步机”理论指出 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这一经济模式运行的必然结果 不停地“生产—消费”符合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银行、工人等)的利益 是他们“合谋”的结果。这一理论流派被认为是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派^[29]。起隔离作用的消费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危害及影响。其实 围绕环境健康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有害物质制造的过程。例如 社会大量需求的瓶装水在生产过程中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瓶子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无论是对原材料的损耗还是排放污染物 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损害。本来是为了增加群体饮水质量的瓶装水 由于其大量生产和抛弃 结果却又导致了负面效果的发生。当大量的人都采用隔离型自保措施时 某种程度上对环境的破坏也会更加严重。

五、结 论

从人群特征来看 市场化的隔离型自保措施需要一定的财力、物力为基础 能够采取此类措施的主要人群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收入群体 他们更多地超越物质需求层面而关注健康风险及其相关问题。隔离型自保建立在个体主义行为方式之上 表现为一种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特征 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囚徒困境”正成为事实。作为一种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被动措施的隔离型自保短期内可以被采用 但由于风险源的广泛分布性和隔离措施本身的局限性 与环境健康风险完全隔离是不可能的 大量的隔离型措施不仅很难真正消除环境健康风险 反而会产生很多的非预期后果和“负外部性” 本身又在制造新的风险^{[1] P28-30}。个体作为健康焦虑传递者和隔离型自保的盲从者 无意中犯下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30]。从根本上说 没有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 个体化自我保护措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31]。

从政府层面来说 环境健康风险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将目标锁定于减少风险源 从源头上降低环境健康损害程度。更为紧迫的是 应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和弱化公众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过度焦虑心理 从而减少那些实质上根本不必要和过度的隔离型自保消费行为。为此 政府应及时准确地公布真实、客观的环境状况 强化对环境健康风险的网络谣言治理^① 规范环境健康产业的运营。同时 正面引导 鼓励和支

持科学家群体积极发出声音 普及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科学知识 发挥其在环境健康风险的建构中至关重要的作用^[32]。

从社会层面而言 隔离型自保反映了在环境领域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割裂 凸显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深远意义。具体而言,“环境共同体”建设势在必行。“环境共同体”有两点含义:其一,“同呼吸 共命运”环境问题的影响范围是特定国家和地区内的整个人群,严格意义上来说 没有人可以完全逃离环境健康风险。其二 在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和环境问题时 需要秉持共同体的观念 承担起个体的责任 协调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本地区利益和其他地区利益 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避免资源浪费和无效率。隔离型自保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与个体的私利性的问题。公众更应该将行动方向转向支持直接的风险消除和环境改善的行动中。就个体层面而言 呼唤现代环境意识的觉醒 积极培养以追求环境问题改善为目标的环境公民^[33] 从而有效跨越个人私利和公共利益的“社会两难”困境。同时 需要大力支持环境 NGO 团体的发展 形成超越个人利益的以环境改善为目标的团体 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参 考 文 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2] 中华人们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环境保护部发布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成果[EB/OL]. (2014-03-14). [2017-09-06].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403/t20140314_269210.htm.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环境保护部通报 2014 年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EB/OL]. (2015-01-23). [2017-09-06].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501/t20150123_294725.htm.
- [4] 贺珍怡. 将环境与健康融入中国发展战略: 新常态与新挑战[J]. 学海 2017(1).
- [5] 殷永文 等. 上海市霾期间 PM2.5、PM10 污染与呼吸科、儿呼吸科门诊人数的相关分析[J]. 环境科学 2011(7).
- [6] 谢海涛 等. 淮河癌症[J]. 财新周刊 2013(38).
- [7] 齐格蒙特·鲍曼. 寻找政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8] 芭芭拉·亚当, 等.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 [9] Bourgauffagnou M D, Hadjistavropoulos H D. Understanding

①网络谣言是加剧健康焦虑的重要影响因素。据统计 网络谣言中食品安全信息谣言占 45%(数据来源: 新华网 网络谣言中食品安全信息占比高达 45% 打击食品谣言刻不容缓[EB/OL]. (2016-12-02). [2017-09-06]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12/02/c_1120041194.htm)。食品安全健康谣言对于加剧健康焦虑和隔离型自保的产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 health anxiety among community dwelling senior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frailty [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09(2) .
- [10]刘岩 张金荣. 风险社会公众面对环境风险的行动选择与应对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5(10) .
- [11]Szasz A. Shopping our way to safety: How we changed from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o protecting ourselves [M].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 [12]中国新闻网. 高增长难掩市场尴尬净水设备普及率不足 5% [EB/OL].(2014-12-18) . [2017-09-06].http://finance.chinanews.com/life/2014/12-18/6889682.shtml.
- [13]中国经济网. 国内首份空净市场报告出炉家庭普及率不及 1% [EB/OL].(2015-04-30) . [2017-09-06].http://www.ce.cn/cysc/zgjd/kx/201504/30/t20150430_5249992.shtml.
- [14]Antoci A.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engine of undesirable economic growth via self-protection consumption choic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5) .
- [15]北京商报网. 第二篇净水市场回顾与展望(一) [EB/OL]. (2015-08-18) . [2017-09-06].http://www.bbtnews.com.cn/magazine/20150819/2015/10/.
- [16]中商情报网. 2014 年中国高端瓶装矿泉水零售额达 128 亿 [EB/OL].(2015-12-07) . [2017-09-06].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12/07/144352z9iv.shtml.
- [17]徐立成 等. “一家两制”: 食品安全威胁下的社会自我保护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5) .
- [18]食品商务网. 有机食品国内外销量年增 30% 或称为朝阳产业 [EB/OL].(2016-12-06) . [2017-09-06]http://news.21food.cn/12/2771353.html.
- [19]新浪科技. 空净家庭普及率不及 1% 新国标即将发布 [EB/OL].(2015-04-30) . [2017-09-06].http://tech.sina.com.cn/e/x/2015-04-30/doc-iawzune4621222.shtml.
- [20]Sun C, Kahn M E, Zheng S. Self-protection investment exacerbates air pollution exposur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7(131) .
- [21]洪大用 等. 地位差异、适应性与绩效期待——空气污染诱致的居民迁出意向分异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6(3) .
- [22]小木虫论坛 [EB/OL].(2017-01-10) . [2017-01-15].http://muchong.com/bbs/viewthread.php?tid=10976361&fpage=1.
- [23]阿里研究院. 中国绿色消费者报告 [EB/OL].(2016-08-03) . [2017-09-06].http://www.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21025.html.
- [24]人民网. 王思聪食材全进口面是进口面水是斐济的水 [EB/OL].(2016-09-29) . [2017-09-06].http://bj.people.com.cn/n2/2016/0929/c233082-29079861.html.
- [25]陈阿江. 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社会建构与治理转向 [J]. *社会学评论* 2016(3) .
- [26]陈阿江. 论人水和谐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
- [27]Douglas M, Wildavsky A. Risk and culture. Berkeley [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5) .
- [28]卜玉梅. 风险的社会放大: 框架与经验研究及启示 [J]. *学习与实践* 2009(2) .
- [29]Schnaiberg A. 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0]汉娜·阿伦特. 反抗“平庸的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31]Johnson T, Mol A P J, Zhang L, et al. Living under the dome: Individual strategies against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59) .
- [32]汉尼根. 环境社会学: 第 2 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33]邹庆治.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环境公民理论 [J]. *鄱阳湖学刊* 2015(2) .

Isolated self-protection: a market response to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GENG Yan-hu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high-risk period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public health anxiety is increasingly strong.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coping strategies, the self isolation which the individual through the market means to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the pollution sources, and then achieve self-protection increased. The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of isolated self-protection measures are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residents' health and anxiety, the enhancement of purchasing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The isolated self-protection based market has serious potential consequences, such as the rep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pollution indifference and the withdrawal of elit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waste of social resources. Isolated self-protection is only a temporary solution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nd it requires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eliminate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t large.

Key Words: health anxiety; isolated self-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market response; environment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校对:冯金忠]